

RES PUBLICA ▶ 公共译丛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心灵的习性

美国人生活中的
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

[美] 罗伯特·N. 贝拉 等著
周穗明 翁寒松 翟宏彪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S PUBLICA ▶ 公共译丛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心灵的习性

美国人生活中的
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

[美] 罗伯特·N. 贝拉 理查德·马德逊
威廉·M. 沙利文 安·斯威德勒
史蒂文·M. 蒂普顿 著

周穗明 翁寒松 翟宏彪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0 - 682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习性: 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美] 罗伯特·N. 贝拉等著; 周穗明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04 - 9425 - 6

I. ①心… II. ①罗…②周… III. ①民族精神—美国②民族心理—美国 IV. ①K712.03②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377 号

责任编辑 姜阿平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得主罗伯特·N. 贝拉 (Robert N. Bellah)，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埃利奥特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是许多著作，包括《罗伯特·贝拉读本》的作者。理查德·马德逊 (Richard Madsen)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民主的习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威廉·M. 沙利文 (William M. Sullivan) 是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深学者和《工作与正直》(第二版)的作者。安·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她最新的著作是《爱的谈话》。史蒂文·M. 蒂普顿 (Steven M. Tipton) 是艾摩利大学和坎德勒技术学校的社会学和宗教学教授，以及《公民讲坛》的作者。这些作者还共同致力于《好社会》的写作和共同编辑了《意义和现代性》(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中文版译序

《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以下简称《心灵的习性》）一书新的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读者隆重推出了。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由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得主、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教授罗伯特·N. 贝拉（Robert N. Bellah）领衔的五位学者撰写，首次出版于1985年，后于1996年、2008年两度再版。作为中美建交以后由美国官方提供的第一本中美文化交流书籍，它的第一个中文版由我们翻译，于1991年面世。除了中文版以外，该书还曾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该书于1996年、2008年两度再版的事实，表明了它的人文社会价值和受众关注度，而这也是新的中文版在其原版问世25年、第一个中文版出版近20年后再度闪亮登场的重要原因。

《心灵的习性》是一本谈论美国个人主义和关于弥补这种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毁灭性后果的书。它从文化价值观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习俗在美国从殖民地时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探究了美国现代化的文化深源。由于这本书的敏锐性、深刻性和预见性，使它成为继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

名著《美国的民主》之后关于美国人自身的文化研究的最重要书籍，堪称经典。

作为美国国家畅销书，该书出版之后屡获高度评价，曾获普利策奖之一般非小说类评审团特别大奖、《洛杉矶时报》书籍奖、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教育类书籍最高荣誉奖等。美国《新闻周刊》称它是“才华横溢的分析……价值可与托克维尔比肩的、关于这个国家一种道德状况的信息”；《纽约时报书评》称它是“非凡卓越的……优秀的写作，根本摆脱了行话套话。它传递了一种强烈的道德紧迫感”；《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它是“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竖立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去检验我们自己，使我们敢于质问我们的社会正在向何处去。它将让你质询你自己的习性，观察你自己的心灵。没有多少书具有这种能力”。

在1996年英文版序言中，针对全球化、信息革命、苏东变局等时代剧变，作者在当时已经看到了随新自由主义潮流而来的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在新形势下，作者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及其当代演变表达了三重看法：第一，极端个人主义（书中用“激进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比10年前《心灵的习性》出版的时候更为严重；第二，这是一些“被扭曲的个人主义的形式”，是托克维尔担忧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第三，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仍然是有价值的，不能忽略个体的个人的核心重要性。

作者认为，只有矫正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及其后果，回归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才能恢复美国社会的活力。因此，作者在1996年序言中提出了他们对矫正方式的分析和看法，也表达了三重意思：第一，摆脱极端个人主义的中心点，是要恢复传统中对人类个体的社会维度的正确评估。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而是包含着社会责任的；第二，美国文化传

统中除了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传统之外，还有《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作者将个人主义称为“美国人的第一语言”，将《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称为“美国人的第二语言”）。尤其是作为美国文化内在传统的《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提供着维护社会团结、制止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源；第三，美国人的文化观念需要一个根本转变和重新定位，即转向重视共同体和团结。作者运用《心灵的习性》出版后10年中出现的社会资本、公民成员资格、共同体主义（或译为“社群主义”）等理论，对新资本主义作出了如下批判：（1）破坏了社会组织合作、规范和信任，使社会资本衰减；（2）导致了公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引发了公民成员资格危机；（3）瓦解了各个层面的共同体感和社会协作，造成了社会团结资源（如美国民间社团的自愿服务传统）的流失。

作者指出，个人主义文化与新资本主义观念的崛起有关。新资本主义观念达成了对个人自由选择的绝对信仰与市场决定论的结合。但是，这种市场决定论是一个意识形态骗局：它利用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对国家的警觉，却反过来运用国家无情地实行了“市场规则”。新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有致命缺陷的政治议程。它的新自由主义公式制造了这个国家严峻的社会紧张状态。基于这一分析，作者强调，在社会分裂加剧，阶级分化和矛盾加深的危机背景下，破解这一困局，不在于解决个人问题（如不当的家庭价值观导致的个人失败），不在于复兴社区，而是在于寻找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答案。这个答案中不仅包括从根本上改变公共政策，还要从根本上更新文化价值观。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将私有化作为解决一切困难的灵丹妙药，反之，本书特别强调，要恢复政府的政治能力和社会的活力，根本上是要恢复美国文化中“第一位的能力”——加强濒临危境

的共同体和团结的能力。这种共同体，不仅是狭义的社区，而是指人类“所有生命的普遍的共同体”；这种团结，是指公民之间彼此的连接感、分享的命运、相互的责任，是让人类共同体在面对各种威胁时可以利用的一致性、凝聚力和相互的信任和责任。作者呼吁，为了共同体和团结去更新文化能力，恢复美国个人主义传统中最好的东西，即林肯和温思罗普所代表的个人主义传统——个人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权利，“自由是做在道德上被证明是正当的事的权利”。这种以新英格兰清教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强调参与的正义，要求每个个体以尊重他们的尊严和自由的方式工作，为共同体和团结、为社会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1996年英文版序言以“一个分裂的家”为题，再次回顾了托克维尔所总结的、林肯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个人主义传统。作者痛心指出，在《心灵的习性》发表的第二个10年后，美国公民的生活机会的不平等已经极大地扩张了，美国这个家今天不是被奴隶制所分裂，而是“被深化的阶级分化所分裂”。作者称，这种不公正的现实剥夺了无数人充分参与社会并将他们自己理解为个人的能力；并称“这是美国人不情愿面对的那个衰败中的秘密”。

相对于1996年英文版序言，本书2008年英文版序言非常简洁。作者指出，20年的现实发展证明，《心灵的习性》为美国文化描绘的图画完全正确。而且，他们所指出的在美国文化内部传统的作用，尤其是《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已经提供了通过坚持对团结的热望制止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源。“这些理念是有用的。”作者不无自豪地宣称：美国社会的社会包容和公民平等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中所体现的、克服种族和性别障碍的那些仍未完成的努力”。这些努力背后的理念，将为美国人民处理当前的问题提供思想资源。

从写作上说，这本书也很有特色。作为一本进行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20 年多年前贝拉教授等人撰写的这部书观点独到、资料翔实，尤其是文风非常朴素，绝无不合时宜的一些学术著作的那种人为卖弄的艰涩和花哨，因此非常好读易懂。

从阅读快感和获得新知的角度看，本书也很有欣赏价值。作者的平实文风固然让该书读起来轻快怡人，然而其原创内容更具吸引力。如果说近 20 年前阅读该书时，由于时空的隔阂和相关社会背景的生疏，中国读者还有些雾里看花、看不真切的话，那么，在 20 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在文化观念上正在发生的类似演变已经使我们完全能够看懂并理解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担忧。如果该书有助于国人的深入思考，进而反思我国文化观念的演变和存在的问题，那将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回报。

由于作者在英文版再版序言中对全书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了进一步阐发和说明，我们在新的中文版中忠实地体现作者的意图，在 1991 年中文译本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包括作者为本书撰写的“1996 年版序言”、“2008 年版序言”，尤其是一个非常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内容的“关键词术语表”。我们对本书 1991 年中文版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做了个别调整和润色。这些新的翻译、修订等工作，均由周穗明和翁寒松完成。

周穗明 翁寒松

2010 年 8 月 31 日于北京

2008 年英文版序言

我们时代的大的斗争，被视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既然这些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美国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确是政治上最好的东西，而任何对民主的反对都是很坏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什么。由于存在着民主政治的反对者赢得自由选举的情况，所以我们时常说，社会保有自由选举是个成问题的观念。在《心灵的习性》中，我们极力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这本因使民主成为一个好词而扬名的书^[1]出发来描述民主。值得铭记的是，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中，民主被认为是一个与共和政体完全不同的、坏政府形式，通常被视为一个有着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因素、而三者无一主导因素的“混合体制”。美利坚共和国*的奠基人有意识地反对民主，而我们的宪法就是以混合体制的理念写就的：存在着君主因素（总统）、贵族因素（参议院）和民主因素（众议院）。

民主来自希腊语 *demokratia*，意指人民统治，而这意味着直

* 原文为 The American republic，即指美利坚合众国。——译者注

接的统治而不是代议制的统治，因为古代希腊人没有代议制民主的理念。古代民主政治最成功的例子是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自由的男性成人公民的确通过他们对议会的参与进行统治，做出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和所有人都可以投票的大会。不幸，关于雅典的民主，我们知道最多的东西却是来自于它的批评者，首先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称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而是“穷人统治”，因为至少相对来说，大多数公民是贫穷的。但是在这种观点的批评者看来，他提倡的穷人统治是反对非穷人的，因而不公正的。必须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批评寡头政治即少数人的政治的，认为它是基于富人利益故而也是不公正的。尽管柏拉图欣赏哲学王的统治，但是当确认这是最不切实际的观点之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烈地反对暴政，即那种服从于单一利益的个人统治。亚里士多德是首先支持混合体制理念的人之一，他称这种混合体制为城邦制（politeia）。

民主观念史的这一附加陈述告诉我们，不仅自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直到离现在也许不到 200 年以前，民主术语还不是正面的理念，而且民主和专制只是经典政治哲学说明政府形式的少数术语中的两个。早在希罗多德时期，我们发现了三种关于政府基本形式的描述：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在民主和专制这两个选项以外，便是希罗多德所说的第二种统治形式，即寡头政治，或少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贵族和较富有者的统治。

在这一经典的看法中，前两种政府类型各有好形式和坏形式的可能（一个人的统治既可能是一种君主政体，也可能是一种暴政；而少数人的统治则既可能是一种贵族政治，也可能是一种寡头政治），但是多数人的统治几乎是不存在好形式和坏形式

的——它彻头彻尾是坏的。在这一思维传统中，托克维尔不仅用民主和暴政之间的对比（我们记得，当他谈到存在“民主的暴政”以及“民主的自由”的可能性时，尽管认为现有的美国体制偏爱民主的自由，他仍然具有对民主的传统恐惧），而且用民主制和贵族制之间的对比进行研究工作，因为他认为法国的传统相当贵族化，虽然它有其优点，但在根本上同样是反自由的。^[2] 尽管他不使用寡头政治一词，即描述少数人统治的那种坏形式的经典术语，但是他经常使用贵族统治一词，描述少数人的自私统治。此外，他不仅将贵族统治视为迅速逝去的旧时代的特征，而且认为它甚至可能在民主过程中再次出现，尽管他所希望的是前者。他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警告，不得不借助于他那个时代才开始出现的新经济组织形式，这一形式正如在第二册第二部分第二十章中所描述的，被冠以预示性的标题：“五月的贵族统治如何为工业所创造”。^[3] 同时，在这一章的最后段落中，托克维尔调整了他的批评，他突出地强调了贵族：

我认为，一般而言，我们看到在我们眼前崛起的制造业贵族，是地球上出现的最努力的人。而同时，他们也是最严谨的和最不安全的人。

无论如何，民主的朋友应当让他们的眼睛始终忧虑地盯着那个方向。因为不断延续的不平等状况和贵族政治一旦找到它们走进该社会的通道，它们就将通过那扇门进入。^[4]

由于寡头政治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威胁，我们相信今天、尤其是在美国崛起的，是走向寡头政治的趋势。

在《心灵的习性》中，我们追随的是托克维尔对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成效的开创性分析。托克维尔看到了美国民主的

多种独特特征，尤其是他所称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和著名的个人主义。虽然他确认了如同受到神的启示般的走向平等的那种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为走向个人主义的那种趋势的后果而担忧。在《美国的民主》第二册第四部分第六章中，以“民主国家必须担心哪一类专制（Despotism）”为题，托克维尔思考着一些存在于民主政治内部的专制的潜在可能性。^[5]必须担心的那类专制的民主已被称作“软专制”：即一种几乎没有被注意到其发生的专制。这种专制发生的一项条件是托克维尔所警告的个人主义，它是美国实验的致命弱点。正如他对个人主义的描述，“他们（公民）每一个人，龟缩到他自己的躯壳之中，几乎不关心其他人的命运。对于他来说，人类只存在于他与他的孩子和他与他的个人朋友的关系之中。至于他的其他公民伙伴，则什么也不是。”在这些环境下，掌权的那些人可以变得不受限制，几乎没有公民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他写道，一个“有序的、温和的、和平的奴隶制”，正如他曾经描述过的，“比一般想象的更能够以某些外部自由形式被结合，并且存在着一种甚至在人民主权的阴影下确立自身的可能性。”^[6]

当托克维尔指出新的工业和金融贵族（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寡头）的可能性时，他并没有想象过发展出一种支持它的统治的机制，一种将会延续民主的形式而不延续其实质、并且还导致不平等不断增长的统治机制。金钱的巨大力量决定着选举结果、美国两个主要政党都受惠于金融富豪的事实，这些在他的时代还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他预见了国内的软专制，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一种支持在国外实行硬专制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当然，他也没能预见到生态危机和供给递减条件下对石油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后者正在不断引燃更为暴力的全球冲突。

最近，约翰·邓恩（John Dunn）描述了民主术语的奇特历

史，并且提出，只有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主理念才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具有了某种政治可能性：“首先正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把民主带回到生活中作为政治效忠的焦点：民主不再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和显然难以相信的政府形式，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并且也许最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极和权力之源。”^[7]他指出，作为极端时刻的极端主义者的革命领袖巴贝夫（Babeuf）当时所描述的民主具有两种发展走向：民主既会造成一个平等的制度，也会造成一个利己主义的制度，而这取决于私有财产是被社会化还是被神圣化。^[8]法国大革命后近 200 年来，关于这两种选择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只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失败才告终结。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两种“民主”形式都造就了非常不平等的统治：一种是以财产平等为名义的极权主义国家，另一种是以自由市场经济著称的、在利己主义制度下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9]

托克维尔看到了许多东西，但他在 19 世纪上半叶写作时，不可能看到每件事情。他关于民主由于形式大于内容实质因而可能终结的担心，似乎正在我们的眼前成为现实。相应地，他关于平等会在发展中自然生成的感觉，也显然是一个错误。自《心灵的习性》20 多年前首次面世以来，美国公民生活中机会不平等的极大增长已经得到证实，尤其是在健康医疗、经济安全和教育机会领域。这种不平等的增长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即使由于部分地得益于新的信息技术，总的经济生产力在此期间获得了可观的增长，但是来自这些增长的几乎所有利润，却落到了处在收入分配最顶端的少数人手中。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不去或不能够阻止不平等的增长并把我们的不断增加的财富用于共同福利呢？

在这里我们相信，托克维尔的分析仍然对我们多有教益。个

人主义与对政府、尤其是国家主义的政府的强烈怀疑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私有财产和政府控制已极大发展的时代），是我们摆脱寡头的一个主要依据。这些发展使托克维尔有关“贵族统治”（或像我们所说的寡头政治）将重新复活的警告，可以直接适用。的确，自《心灵的习性》出版以来，不平等的增长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不祥地持续发展着，对它的警觉同时也在增强，甚至可以中肯地说，马克思主义正在一些地方酝酿卷土重来，正如托尼·朱迪特（Tony Judt）最近所警告的那样。^[10]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都不会欢迎一种与强制性国家天然联系的教条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回归，可是我们如此热衷于一种教条的市场意识形态、即用以证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国家的那种理念，就是健康的生存状况吗？后者果真全方位地支持民主吗？

20 年之后看，我们在《心灵的习性》中所描绘的美国文化的画面，似乎都再正确不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指出了美国文化中的传统、尤其是《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的作用，它提供了通过坚持对团结的热望而逆转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源。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许多持续为公共利益工作的公民群体，已经发现这些理念是有用的。毕竟，美国人已经在各个不同时代认识到了比我们早期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更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公民平等，特别是在仍未完成的克服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努力方面。存在于这些努力背后的理念，在处理当前问题时仍然可以为我们服务。

《心灵的习性》是一本关于美国个人主义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弥补其灾难性后果的种种努力的书。许许多多的公民组织继续在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不同类型的世界工作着，《心灵的习性》在许多方面仍旧可以作为它们的一种手册。

注释

[1] 约翰·邓恩写道，“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这一承认：民主是现代政治经验的独特性的关键，任何一个希望抓住那种经验特征的人必须关注并接受民主恰好意味的东西”。邓恩：《民主：一部历史》，大西洋月刊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 页。

[2] 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英译本的第十二版序言。乔治·劳伦斯译，J.P. 迈耶尔编：道布尔戴公司铁锚丛书 1969 年版，第 6 页。

[3]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 555—558 页。

[4] 同上书，第 558 页。

[5] 同上书，第 690—695 页。

[6] 同上书，第 692—693 页。

[7] 邓恩：《民主》，第 118 页。

[8] 这些术语实际上可能源于巴贝夫的追随者博纳罗蒂。邓恩：《民主》，第 124 页。

[9] 邓恩写道，“市场经济是去除人类曾已形成的平等的最有力的机制”。而市场经济的胜利，导致邓恩用资本将它描述为“利己主义的世界秩序”。邓恩：《民主》，第 118、137、171 页。

[10] 托尼·朱迪特：《与那一切告别？》《纽约书评》2006 年 9 月 21 日，第 88—92 页。

1996 年英文版序言

分裂的家

“我们应当怎么生活？……作为美国人，我们是谁？”自从我们在《心灵的习性》的开端写下这些问题以来，10 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已经呈现出一种危急的紧迫性。这些问题的意义自从这个共和国开创以来就已经在争论，但是从来不比现在更多，此时我们听到“更新美国”和“战胜道德危机”的呼吁。

我们美国人总是想到要去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强烈地渴望自己有自信心，有活力，相信凭着自己辛勤的工作和良好的素质，能够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达成自尊和正直。然而，环顾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到处发现对我们社会稳固的不安和对它的未来的关切。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我们是否能够信任我们的制度、我们选举出的官员、我们的邻居，甚或实现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期望的能力。而焦虑总是接近一种时时摆脱不了的恐惧的层面：事情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是出问题。对于许多美国人，这些恐惧在对犯罪、道德衰败和收入与机会的分化加深的担忧中达到了顶点。关于我们的工作、适当的收入和我们的家庭的未来，特别是我们孩子的福利，存在着一种令人苦恼的不确定性。

处于许多这些恐惧之下的是这一现实：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的增长不再意味着机会，而反倒是“小型化”、